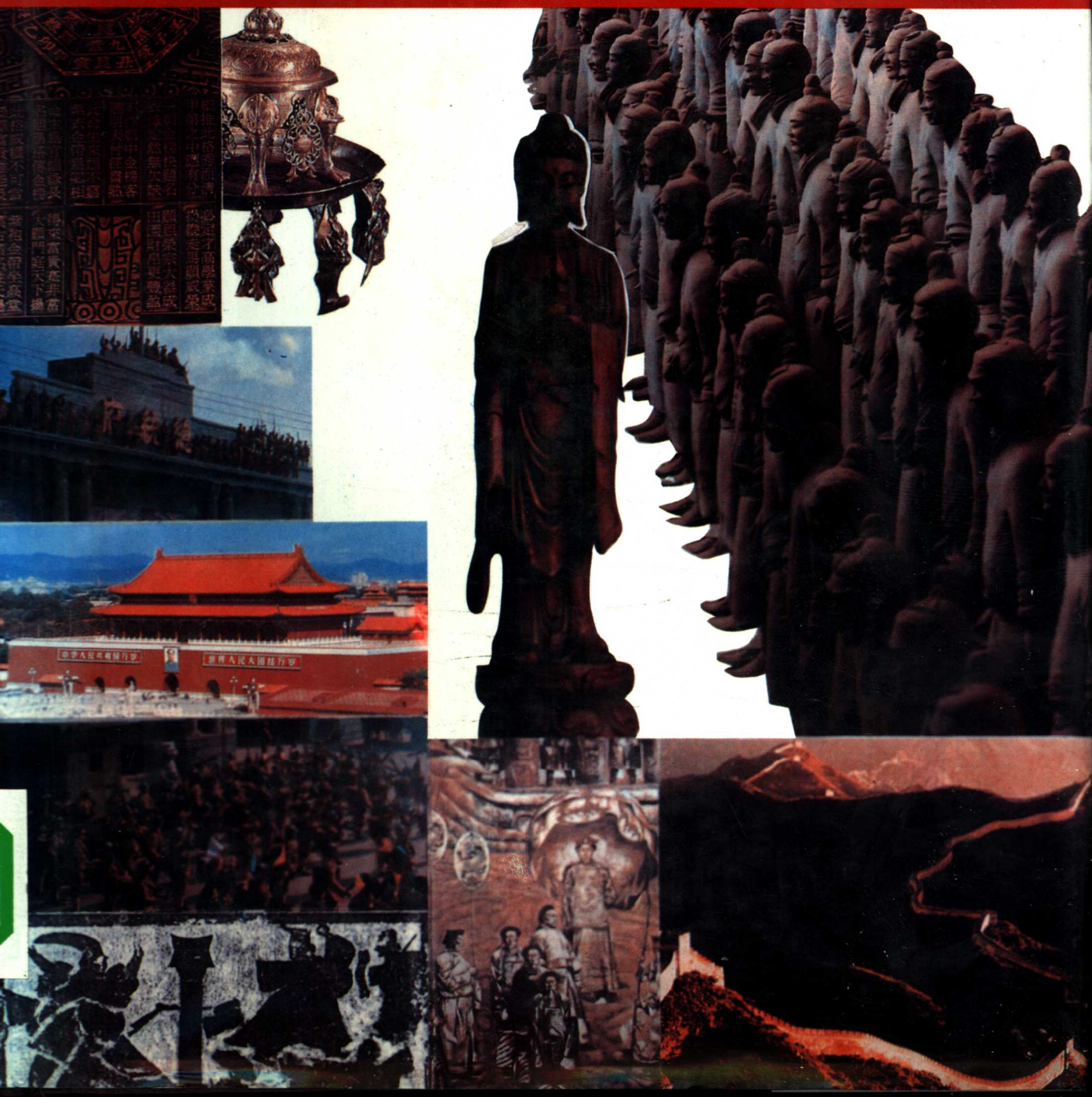


改变中国的100件大事

张春林 孔祥智 邓一海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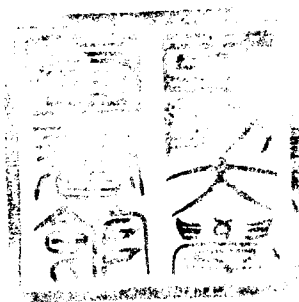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0 1383 8

413

改变中国的 100 件大事

张春林 孔祥智 邓一海 主编



64402
06

中国经济出版社

改变中国的100件大事

张春林 孔祥智 邓一海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9 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浩如烟海的史实中挑选了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100件大事,在读者面前勾画了历史发展的大致轮廓。书中事件的选择对思想文化领域有所偏重。每一件事,叙述了其历史背景,发生发展过程,并对其历史影响作了简要评述。

本书力求用故事性、趣味性的语言表达史实,使语言通俗流畅。它适于社会各层读者,是一本可雅俗共赏的读物。

责任编辑:华连斌

封面设计:曹全弘

改变中国的 100 件大事

张春林 孔祥智 邓一海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邮政编码: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原人民交通出版社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16 37印张 1000千字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5017-1846-6/Z·287

定价:29.50元

主 编:孔祥智 张春林 邓一海

副主编:徐付群 刘开林 杨 阳 马九杰 张 锋

编委会:(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 瑜	马九杰	马秀琴	于 兵	于博文
万 敏	长 弓	王 刚	王振东	邓一海
孔祥智	叶旭端	冯继勇	朴义顺	刘文清
刘文瑜	刘开林	刘 世	刘谷庭	刘 林
邢亚飞	孙 剑	苏云涛	李 江	李保国
李继先	李振远	李淑英	阮 帆	杨 阳
张 忠	张春林	张 锋	张学成	吴显明
沈 静	尚九正	赵元任	赵东晓	季正矩
周镇平	赵慧荣	陈国光	陈建国	陈胜庭
贺 军	侯 纯	郭均忠	姜 鹏	胡宗山
胡知生	高玉君	徐付群	耿光连	耿建忠
曹江秋	逸 轩	黄 明	黄 巍	康 涛
崔莉霞	董恩忠	黄 琦	解贵民	訾 磊
碧 波				

目 录

1. 开九州之风化 传万世于一脉——炎黄文化之形成	(1)
2. 普天之下皆王土 率土之滨共王臣——夏的建立	(6)
3. 扭转时局的决策——盘庚迁殷	(11)
4. 三十四王朝 八百年江山——西周的建立	(15)
5. 由盛转衰 群雄并举——西周东迁	(19)
6. 诸侯纷起竞称雄——春秋争霸	(22)
7. 老庄合体——道家学说的形成	(27)
8. 中国文化的血脉——儒家学说的形成	(35)
9. 兵学鼻祖 武经之冠——《孙子兵法》的形成	(45)
10. 建法立制 富国强兵——法家学说的形成	(50)
11. 一国定三分 大夫尽称王——三家分晋	(56)
12. 强盛的楚国 灿烂的文化	(61)
13. 合纵连横:联盟与反联盟的斗争	(70)
14. 七雄争战竞存亡	(74)
15. 一统九州 同风天下——秦的统一	(80)
16. 千秋功罪 谁人评说——长城的构筑	(86)
17. 焚书坑儒 千古遗恨	(91)
18. 霸王引恨乌江 高祖咸阳称帝——楚汉之争	(98)
19. 百年帝国的大厦之基——汉初之治	(103)
20.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109)
21.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发愤著《史记》	(113)
22. 劳而无功的变革——王莽改制	(118)
23. 高阳起兵 光武中兴	(124)
24. 从释迦牟尼到禅宗	(128)
25. 文明史的飞跃——造纸术的发明	(139)
26. 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	(144)
27. 火烧赤壁定三国	(150)
28. 政乱朝危 咎在八王	(156)
29. 雄师鏖战定南北——淝水之役	(162)
30. 文治汉化图进取——孝文改革	(167)
31. 六朝随流水 隋纪开新元	(173)
32. 不计门第 唯才是举——科举制	(176)

33. 百年千载后 恩在怨消磨——隋朝大运河的开掘	(185)
34. “秦亡汉续”悲剧的重演——隋灭与唐兴	(190)
35. 推刃同气 喋血禁门——玄武门之变	(196)
36. 帝国雄风 光被四表——唐初“贞观之治”	(205)
37. 翁婿相称 唐蕃一家	(213)
38. 唐律：雕塑传统中华文明的法律基石	(217)
39. 大略建周 巾幗一皇	(221)
40. 李杜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李白、杜甫的诗歌创作	(226)
41. 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	(234)
42. 朋比为党 倾权误国——唐末牛李党争	(238)
43.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得江山	(243)
44. 不败而败：澶渊之盟	(249)
45. 传文明于万里——印刷术的发明	(255)
46. 存天理 灭人欲——理学的形成	(258)
47. 天法不足畏 祖法不足守——王安石变法	(264)
48. 大厦将倾 独木难支——靖康之变	(269)
49. 雄据中原：女真史上逞英豪	(273)
50. 铁骑踏出的帝国——元的统一	(278)
51. 白莲传教 红巾起义——元末大起义	(284)
52. 从牧童到皇帝——明朝的建立	(288)
53. 乘万里浪 扬大明威——郑和七下西洋	(292)
54. 英宗被俘土木堡 于谦誓守北京城	(297)
55. 儒冠儒服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	(302)
56. 中国古代的技术百科全书——《天工开物》的创作	(308)
57. 与时代共命运 与人民共呼吸——东林党的活动	(315)
58. 世情染乎文变 时序系乎兴废——《三国演义》的成书	(319)
59. 决战：硝烟里崛起的清朝	(324)
60. 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降清	(330)
61. 册地封号 藏汉结盟——册封达赖、班禅	(336)
62. 六十一年风和雨——康熙“治平”	(340)
63. 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大碰撞——马嘎尔尼来华	(346)
64. 大国的平等协定——尼布楚签约	(350)
65. 避席畏闻文字狱 著书都为稻粱	(353)
66. 跨越沙漠的风流皇帝	(360)
67. 传神文笔足千秋 不是情人不流泪——曹雪芹著《红楼梦》	(264)
68. 百年屈辱史的第一幕——鸦片战争	(371)
69. 东南半壁十四载——太平天国运动	(378)
70. 辛酉政变 慈禧亲政	(385)

71. 坚船利炮强国梦——洋务运动始末	(391)
72. 百日维新 昙花一现	(397)
73. 惊天地 泣鬼神——中日甲午战争	(403)
74. 铁拳纷起驱洋虏——义和团运动	(412)
75. 粉饰门面 自食恶果——清末新政	(418)
76.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424)
77. 封建帝制的丧钟——伟大的辛亥革命	(429)
78. 卖国倒退 割据称雄——北洋军阀的兴衰	(435)
79. 披肝沥胆 良心救国——“五四”运动	(443)
80.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449)
81. 第一次国共合作	(456)
82. 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大革命——北伐战争	(462)
83. 普天一色满地红——东北“易帜”	(468)
84. 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八一”南昌起义	(479)
85. 进军：红旗插上井冈山	(483)
86. 最后关头已临到 挺剑而起在今朝——卢沟桥事变	(489)
87. 生死攸关 扶危持颠——遵义会议	(494)
88. 西安事变	(500)
89. 延安整风运动	(506)
90. 历经八年血火路 驱狼除虎建奇功——抗日战争的胜利	(511)
91. 运筹帷幄定乾坤——震惊世界的大决战	(518)
92. 凤凰涅槃——新中国的诞生	(524)
93. 雄兵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	(532)
94.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539)
95. 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中共“八大”	(547)
96. 反右派斗争	(551)
97. 大跃进狂澜	(556)
98. “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	(562)
99. 篡党夺权 一枕黄粱——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568)
100. 成功的会议 伟大的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576)

开九州之风化 传万世于一脉 ——炎黄文化之形成

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创造了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文化。这些文化对于我们的民族无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都留下了传统的烙印。那么,就让我们从这瑰丽的文化宝库中俯拾些许闪亮的珍宝吧。

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起源

关于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起源,自春秋战国时起,传统的观点认为均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尧舜时投“四罪”于四裔,于是有了蛮夷戎狄。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到,由于共工、驩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由此可见,古代的正统观念虽然歧视边疆民族,但却又认为少数民族与华夏同出一源。

自17世纪西欧开始对中国有所了解时起,即有人认为中国人与中国文化来自埃及,以后又相继有人认为来自西亚、中亚、南亚或东南亚,即形形色色的“外来说”。

到底孰是孰非?新中国考古学的飞跃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充足的科学依据。我国旧、新石器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现与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彻底推翻了“外来说”,肯定了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华大地,虽然在其发展中吸收了不少外来成分,但就起源而论是土生土长的。传统的认为中华民族与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单源中心说也得到了修正,证明了中华文化既是多元区域性发展,又呈现向中原内向汇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不平衡发展。

按照《国语》、《世本》、《大戴礼记》中的《帝系》、《五帝德》的记载,中华民族的最早祖先为炎帝与黄帝。按先秦文献记载: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黄帝、炎帝联合起来与九黎大战于涿鹿(今河北涿鹿县东南),打败九黎,杀其首领蚩尤,取得了对九黎的决定性胜利。随后,炎黄又大战于阪泉(一说与涿鹿同地,一说在今山西运城县盐池),三战而黄帝打败炎帝,成为黄河中下游大部落联盟的首领。黄帝、炎帝、蚩尤的战争与融合,反映着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氏族部落集团长期交往、互相影响,最终通过兼并与征服结成稳定的部落联盟的历史过程。

黄帝以后,以禅让方式推举、确立大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此后,随着夏启对禅让制的破坏,经过夏、商、周三代的融合,华夏族体的雏型已经形成。经过春秋战国,到秦灭六国而统一中国时,华夏民族共同体已成为以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集团交融汇聚形成为核心,由四方各族分化出一部分在河、淮、江、汉地区融合而成的了。所以,华夏是由多源汇聚复合成的民族共同体,它是蛮夷戎狄异化又同化的先进产物。也就是说,中国是蛮夷戎狄共同缔造的。自秦汉以后长达2000年的发展过程中,又经历了几次民族大融合,到元明清时,当代中国各民族均已形成。2000多年来,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对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宗法制度及家族制度

家族由若干具有亲近的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我国古代的家族一直是以父系的血缘联结的,而若干出自同一男性祖先的家族又组成宗族。《尔雅·释亲》即把由同一高祖父传下来的四代子孙称为宗族。宗族和家族密不可分。所以,我国古代的家族制度与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谓宗法,是指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共同的祖先,维系亲情,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

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

宗法制度是由父系氏族社会的家长制演变而来的。父系氏族社会父家长的绝对权威——支配家族成员,甚至是生杀予夺,产生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祭祀祖先的仪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法制度逐渐形成,它主要实行于统治阶级内部,成为调节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维护贵族世袭统治、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

确定继统秩序和在宗族内部依血缘关系区分尊卑亲疏、规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二者相辅相成,是宗法制度的基本内容。正如《礼记·礼运》所说,“大人世及以为礼”(以子继父为世,以弟继兄为及),夏朝王位世袭成为制度,而夏王以下,各级奴隶主贵族也都是“世及以为礼”。而夏王的宗族被封为诸侯,既分享部分统治权,又承担为夏王效力的义务。

与此相适应,为加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祖先崇拜被推进到新的高度。从文字学上看,“宗”是个会意字。《说文·宀部》:“宗,祖庙也。”宗的本义就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亦即祖庙、宗庙。宗庙祭祀是头等重要的的大事,由宗族中地位最高的成员主持。同一宗族的人具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宗庙,共同的姓氏,共同的墓地,同受宗法制度的约束。

到了商代,有了嫡庶之制,也就是在多妻的情况下,区分作为法定配偶的正妻和众妾身份上的尊卑,并从而规定正妻所生的嫡长子的优先继承权。这是宗法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史记·殷本纪》记载:“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由此可见,法定配偶与其他配偶之间的嫡庶之分,尊卑之别。

到了西周春秋时期,宗法制度更臻于完善,这一阶段的宗法制度最为典型、严密。这一时期宗法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在严格区分嫡庶,确立嫡长子的优先继承权的前提下,在宗族内部区分大宗、小宗,无论大宗、小宗都以正嫡为宗子,宗子具有特殊的权力,宗族成员必须尊奉宗子。

《礼记·大传》中有一段话,说的是诸侯宗族旁系的情况: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

所谓别子,是与嫡长子相对而言的。别子不敢祖诸侯,只能分出另立一系,其后世奉之为始祖。这个分出去的别子又会有嫡子、庶子,同样世代以嫡长子为继承人,形成直系大宗。别子的其余诸子,应尊奉继别者为宗,相对成为小宗。他们也是以嫡长子为嗣,这个嫡长子无权继别,但可继祢,称继祢小宗。祢,是已故父亲在宗庙中的神主。庶子除了宗奉直系大宗外,还得宗奉这个继祢小宗。以此类推,根据五世亲尽的原则:规定连同本身,只向上推到第五世高祖,也就是一个人只要宗奉继祢、继祖、继曾祖等小宗。即“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也”。然而只讲五世而迁,一个宗族又会分裂为无数小的宗族或家族而漫无统系,因此又要强调“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也就是大宗要永远受到宗奉。

与宗法制度有关的还有丧服制度。丧服指居丧期间的衣服制度,分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称为五服。丧服不同,居丧期限也不同。丧服的等级是根据与死者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决定的,血缘越近,丧服越重,居丧时间越长,而且嫡庶有别,男女有别。这也是宗法思想的体现。

秦汉以后,宗族与各级政权逐渐分离,严整的宗法体系不复存在。因而后世人说:“自世爵世禄之制度,而宗法始坏矣。”但是,作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各家族内部体现尊卑有序,维护尊长特权,约束族人思想行为,以巩固统治秩序的规范和办法的宗法制度,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始终顽固地存在着,起着巨大作用。

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条件下,聚族而居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一些由于政治上、经济上强大的宗族,在地方上盘根错节,控制一方。到魏晋南北朝时形成了士族制度:高门望族成为上族,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庶族”。士庶有严格的区分。官吏的选拔全看家世、出身。士族子弟,即便无才无德,也可官居高位,而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总是被列为下品,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进入封建社会后期、宋明以来,家族制度以宗谱、宗祠、族田、族长、族规为表现特征。

家谱的普及达到“家之有庙,族之有谱”的地步。在聚族而居的农村社会。几乎没有无谱之族和不入谱之人。正如清代学者程瑶田所说:“族谱之作,与宗法相为表里者也。”修家谱是宗族中的一件大事,由

族中头面人物主持,其目的是“敦孝弟、重人伦、睦宗族、厚风俗”。

宗祠习惯上多被称为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被视为宗族的象征。祭祀时繁缛隆重的仪式充分体现了封建伦理,展示了礼教规范,是一种教化的手段。此外,宗祠也是处理宗族事务,执行族规家法,教育本族子弟的场所。

族田是合族公有的财产,包括山林、土地、房屋等。由于族田可以缓解贫民的反抗斗争,有利于封建统治,所以封建朝廷把购置族田当作“义举”而大力提倡,对捐资较多的人予以旌表。族田的收入除祭祖、办学、办理一些公益事业外,主要用于赡族。族田的赡族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宗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加强了族人对宗族的依赖性,从而诱使他们依附于宗族中的权贵人物。

族长是管理全族事务的一族最高首领。一般由年辈较高的人担任。但他们往往是族中最有财富和权势的,一般都是豪绅地主。族长的权力很大,主要有主持祭祀典礼之权、主管族产之权、对族人的教化和惩罚之权,以及处理族中各种纠纷、调停争端之权。

族长是根据族规行使权力的。族规是宗族的法律,起着维护封建秩序的作用,对族众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不同宗族的族规虽有种种差异,但它们却有以三纲五常为基础,带有浓厚的封建礼教和宋明理学的色彩这些共性。其主要内容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强调尊崇君权,履行对封建国家的义务;规定祭祀祖先的礼仪,宗族首领的推举办法和享有的特权,宗祠、族产、宗学的管理制度以及族产收入的分配办法等;提倡封建伦理道德,规定不同宗族成员不同的等级名分和行为规范;宣扬同族一气,不论贫富应各守本分而又互助互爱,规定了敦本睦族的一些措施;规定对族人立身、持家等方面的要求和禁约;规定立后承继的原则和办法;规定对违反族规家训、败坏纲常名教、损害封建国家和宗族利益的族人的处罚办法。族规虽是民间规约,却具有合法地位,在封建国家的允许之下发挥效力以补充国家法律的不足,对封建统治的巩固起了很大作用。

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社会实行的是宗法等级制度。人的社会地位与尊卑贵贱都有严格地区别。但是尊师问题上,这种无所不在的等级观念却被打破了。师的位置提到了与君并提的高度。《尚书》中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而在民间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也反映出君师并提,老师也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因此有所谓“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身是父”之说。可见尊敬师长已成为社会上一种普遍的道德风尚。

说到中华民族尊敬师长的美德,人们不禁会想到“程门立雪”这一动人故事。“程门立雪”见于《宋史·杨时传》,说的是宋代学者杨时、游酢谦恭敬师的事。

北宋神宗年间,著名哲学家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在洛阳讲授孔孟的儒家经典。许多读书人纷纷去求学,拜在他们门下。南方人杨时,也闻名赶到程颢处登门求师。他学习用功刻苦,进步很快,深得程颢的器重。4年后,程颢死了。杨时听到噩耗,悲痛万分,为了寄托对老师的怀念之情,他在家中设置了程颢的灵牌。

40岁时,杨时为了进一步深造,又去拜程颐做老师。一天中午,他碰到了疑难问题无法解决,便和同学游酢一起去请教老师。到达程家时,正巧程颐在睡午觉。为了不影响老师休息,他们就静静地站在大门外等候。不一会儿,天色阴沉,并下起了鹅毛大雪。过了好久,程颐一觉醒来,看见杨、游二人不声不响、毕恭毕敬地侍立门外,深受感动,赶忙让他们进来。此时,门外的积雪已有一尺来厚,他俩的全身都挂上了一层白雪,他们站立的地方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杨时、游酢尊敬老师的这种美德,完全出于一种真挚的情感,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尊师美德的反映。古人讲尊师,不仅要求态度恭敬,而且要诚心诚意,不论什么情况下,对师长绝不失礼。大家熟知的“张良桥头纳履拜师”的传说,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美好品德。

“一日为师终身不忘”。古人对老师的教诲之恩总是深深感激,他们称自己的老师为“恩师”。正如荀子在《致仕》篇中所写:“水深而回,树落则粪本,弟子通利则思师”。反映的就是弟子对老师的那种流水对源、落叶对根的深情。

从“尊师不论贵贱贫富”到“有教无类”

前面说过,中华民族有尊师的美德。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古人竟能“不论贵贱贫富”来尊师。

商代时,统治阶级为了教育他们的子弟,建立了专门的教育机关,由有德有位的“国老”和有德无位的“庶老”执教,均称之为师。甚至当时一些杰出的奴隶也被尊为师,如成汤时的伊尹,就是出身奴隶阶级的著名的师保。

春秋时代教育事业蓬勃兴起。各家学派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阐明思想。而当时的几个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出身都很微贱。如老子是周王朝管理图书的人员,孔子、孟子、庄子家境都很贫寒。孔子做过办丧事的吹鼓手、管理仓库、牧场的管理员等;孟子则依靠母亲织布维持生计;庄子则做过“漆园吏”;墨子是木匠出身。他们都由于渊博的学识而受到社会和弟子的尊敬。

与“尊师不论贵贱”相对应的是“有教无类”。“有教无类”是孔子首先提出的,他认为人不论富贵贫贱,聪明愚笨,贤与不肖,都应施以教学。史载孔子曾收 3000 学生,分属各个阶层,孔子都同样认真教诲。

“有教无类”的主张在当时具有世界性的先进意义。它打破了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对发展教育、推广知识、传播思想、强化社会道德、提高民族素质,有很大进步意义。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推动之下,中国逐步形成官学、私学并举的教育模式,再加上有才有德的人均可为师,中国古代教育一直呈现出非常繁盛的局面。

注重德育教育

在中国漫长的教育史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道德思想、修身品行的教育一直被放在首位。大教育家孔子明确要求学生首先要潜心于道德修养:“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以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圣人”、“君子”。“圣人”要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对己能“修己”,对人能“安人”、“安百姓”。而对于“君子”则“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因而在教学内容上提出“四教”(文、行、忠、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品德修养。

孔子还注重美育,其主要内容是音乐。孔子把乐与礼结合起来,把美育作为达到善的一种途径和手段。荀子还把音乐分为“正声”、“奸声”,认为音乐对人有潜移默化作用,健康优美的音乐可以把人的趋恶之情引向趋善,而靡靡之音能引人进入邪恶。把音乐的教化作用提高到如此一个理论高度,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特色。

汉代大儒董仲舒认为“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在汉以后的 2000 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儒家学说一直占统治地位,仁义礼治的教育也一直被放在首位。

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中国先人们总结出许多先进的教学方法,这些方法一直流传下来,经过实践的检验,至今仍被沿用。

启发式教学。最早提倡启发式教学的是孔子。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倡导利用学生的求知欲进行诱导教育,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深入钻研的习惯,收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学记》进一步把这种思想概括为一个“喻”字,并作了精辟的阐述:“君子之教,喻也。道(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针对不同教学对象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授以不同的教学内容,这就是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正如陆九渊所说:“人各有长,就其所长而成就之。”因材施教可以尽人之材,不误人。

循序渐进。就是在教授上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孟子曾用揠苗助长的生动比喻说明教育应顺应自然,按部就班,而不能急于求成。北宋教育家张载也从学者的可接受性和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出发,进一步指出,教学要先求平易,注意教材的难易先后次序。

学思结合。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光学习不思考就会无所得，而光思考不学习则会陷入迷惑之中。我国教学非常强调学思结合，注重知识的积累与思考能力的培养。《中庸》明确指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及后世的“尽信书不如无书”，都是要求人们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进行审慎的思考，大胆的怀疑，提出新的正确的观点。

古人还很注意兴趣教育。兴趣是学习的动力。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才能有兴趣，才能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掌握所学知识。所以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有了兴趣才能做到学习时废寝忘食，乐以忘忧。而立志，即树立明确的学习目的是激发和维持兴趣的重要手段。因而陆九渊说：“人惟患无志，有志无有不成。”张载也说：“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有了志向，才能“知学然后能勉，勉然后进而不息。”

官私并举的办学模式

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就有了官学。当时教育为大小奴隶主垄断，有鲜明的等级性和阶级性。

春秋时期，由孔子开办公私学，扩大了教学对象的范围，使得普通百姓也有机会受教育。

汉朝时，中央设立太学，以传授知识、研究学术为主要内容，与今天的大学性质相当接近。太学注重用考试来督促、检查学生学习情况，没有规定年限，只要成绩合格即可毕业，取得一定官职。这与今天大学的学分制颇似。太学还提倡自学。

到了唐代，还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专业教育学校。设有算学、律学、医学等专业，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比欧洲这类学校的出现早了 1000 多年。

宋代时，书院这种新型高等教育组织兴盛。它成为学者讲学、研究学问、修身养性的处所。当时著名的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号称“天下四大书院”。入学者少则数百人，多者上千人。书院中有明确的学规，重视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注重自修，并以高才教后进的教学方法，使高才生在教学实践中尽快地成长起来，早出人才。

从北宋白鹿洞书院产生到清末，书院这种教育形式经历了千余年的发展兴衰，不下 2000 余所，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主要的教育形式。

关心政治的优良传统

中国的太学生历来有关心政治、关心国计民生的优良传统。自太学产生以来，就多次出现过太学生发起的政治运动。

最早的记录是西汉哀帝时，太学生王咸领导 1000 多太学生营救正直官吏鲍宣，使之免于死刑。东汉桓灵年间，政治腐败不堪，宦官控制大权，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联合颍川派大官僚陈蕃、李膺等与宦官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尽管发生两次党锢之祸，太学生被捕 1000 多人，但很多人并未屈服，表现了高尚的气节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明朝中叶东林书院尚气节，有正义感，以时政为演讲之材料，批判道学家的作伪，“讽议朝政，裁量人物”。顾宪成为书院所作的楹联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足见其关心时政之倾向。东林党人反对阉党魏忠贤，遭到残酷镇压。但他们毫不屈服，继续与之斗争，直到“魏阉既败，东林名益高，人乃以附东林为荣”。

从上可见我国知识分子关心时政，敢于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优秀品质。这种关心国事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一直被继承下来。

普天之下皆王土 率土之滨共王臣 ——夏的建立

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它的建立,标志着世袭制在中国的确立。从此以后,“普天之下皆王土,率土之滨共王臣”,被儒家学派涂上了一层深厚粉饰,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首领“禅让”制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代替它的世袭制,在它以后的发展中日趋完善,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扎根几千年而不衰。历史长河滔滔,也冲刷出了多少属于它的悲壮的浪花。

夏族,姒姓,是居住中原的古老部落,大概首先活动在陕晋一带,从西向东发展,逐渐迁徙定居到伊洛河汾地区。

夏族最后定居在豫西、晋南一带,伊水洛水之间是他们活动的中心。《逸周书·度邑解》云:“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国,其有夏之居”包括颍川、南阳,汉代人 also 认为那是“夏人之居”,如《汉书·地理志》云:“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汉颍川郡在今河南省境内;南阳郡的大部分也在今河南省境内。周初分封唐叔去统辖晋南汾水流域一带,称那个地区为“夏墟”,可见那个地区也曾是夏人活动的中心。

夏建国以后,由于游牧部落的习俗的影响,夏都城多次迁移。据《石竹本书纪年》记载:禹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太康居斟鄩相居帝丘,杼居原,又自原迁老邱,孔甲居西河。桀夏居斟鄩。从地理范围看,总的趋势从豫西向豫东发展。

到夏朝末年,夏人活动范围扩大,有“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之说,今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区都成了夏人活动之地。

夏代的世系,在禹以后比较清楚,在此以前,只能追溯到鲧,再往前的话,就比较困难了。虽有线索可寻,但均是神话中的人物,难以视为信史。如一部记载古代帝王世系的较为重要的书《世本》云:“颛顼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也。”这告诉我们,颛顼是鲧的父亲,而这个颛顼,正是一个神话传说中的著名人物。他的神话故事很多,据说他是黄帝的孙子。在封建社会史学家所尊奉的“三皇五帝”旧史系统中,他被列为“五帝”之一,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不过因为颛顼毕竟神话成份居多,因此有关夏的确切世系,最早也就追溯到“鲧”,比较适宜。

鲧是禹的父亲,各书所记相同,无疑应是可信的。鲧所生存的时代,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也就是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这个时期,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运行,新的社会结构格局也开始出现了,人们一面遵循悠久的传统而贯彻原始民主、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受着财富、权势的诱惑和刺激而不再平和宁静。旧的传统虽然在实际上遭到践踏,但并没有被废止,被抛弃,而且至少在形式上它仍然是凛然不可侵犯的,依旧放射着神圣的光;新的人物虽然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此刻的他手中的暴力之剑并不指向旧的传统,而是在旧传统的灵光中为自己的权势开道。鲧作为这一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在他身上,便被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时代的烙印。

鲧是这个时代的一位英雄,然而他却是一位失败了的英雄。他曾接受尧的任命,负责治理洪水。他试图用筑堤挡水的办法治水,但堤坝倒塌,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水患,治了9年也没有成绩。相传舜摄政位以后曾视察治水情况,“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尽管天下之人对舜殛鲧的做法没有异议,但对鲧还是深深怀念,表现在神话里,便是这样一个故事: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息壤”,相传是能够自己生长不已的神奇土壤。鲧不待帝命而将息壤自天庭窃归人间,终至为治水

而献出生命,其事迹颇类于希腊神话中取火的普洛米修斯。这个神话表达了鲧具有不惜生命,为当世除害的精神,塑造了一个正义、勇敢的英雄形象。

虽然鲧治水的事业,没有最后完成,但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而治水所以没有完成,其责任也不能完全归之于鲧。即使从流传下来的关于治水的整个传说故事来看,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分析:虽然鲧的治水失败了,禹的治水成功了,但禹的成功也离不开鲧。因为禹治水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继鲧之业”,是“纂就前绪,遂成考功。”因此,鲧和禹一样,都应给予历史的肯定。

然而,鲧毕竟是失败了,这种失败,不仅表现在他的治水上,更重要的是他政治上的被打倒。按古史上的一些记载,治水失败只是鲧被放逐而死的表面原因,而根本原因却在于鲧与舜争权夺位。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

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又如《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说:

尧以天下让舜。舜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

以上这两段记载,生动表现出了鲧的权势欲及这种权势欲给他带来的后果。他在表面上是反对“尧以天下让舜”,实际上是自己要夺取权势,“欲得三公”。因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最后被殛死于羽山上。鲧在平时的威信并不高,反抗部落联盟的命令并且摧残好人;禀性固执直率而恣情自用并且贪心不足。由此可见,鲧是因政治斗争失败而死的。

然而鲧毕竟是那一时代的英雄,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他的儿子禹的身上继续延续并进一步发扬,终于使禹获得了成功。

大禹——一个站在阶级社会门槛上的伟人,为英雄时代做了总结,又为文明时代铺平了道路。

禹在历史上的主要功绩就是治水。在他的父亲鲧治水失败而被放逐羽山死后,作为惩罚性质,禹接替了他父亲治理洪水的艰巨任务。禹联合了共工氏和伯益、后稷等许多都落,共同向洪水展开了大规模的斗争。关于禹治水的情况,《墨子》中有载:

昔禹之涇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

这段话的意思是,从前禹堵塞洪水,又开决江河使四方的夷族与九州之地都能相互交往,这以后,天下著名的河流就有三百,其支流多达三千,其他小河流无计其数。禹亲自拿着盛土的橐和挖土的耜参加劳动,使河流渠道纵横交错。禹东奔西走,水里来,泥里去,连腿上的汗毛都磨掉了,他栉风沐雨操劳奔波,使众多的方国都得以妥善安排。禹是一位大圣,竟为天下而如此劳苦。

禹总结了鲧治水失败的经验教训,放弃了筑堤堵水的办法,改用疏导的办法,终于制服了洪水。应该注意的是,禹治水成功和鲧治水的失败,这主要并不是因为他们二人才能的大小不同,这件事情表明,在鲧的时候,社会生产力还比较低,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还不强,到了禹的时候,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人们战胜自然的能力也就加强了。大禹治水的成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手工业和交换的发展。从而加速了原始公社制度的瓦解,为向奴隶的过渡创造了物质条件。

从我们今天的历史主义观点看,禹作为跨越文明时代门槛的伟人,其卓越杰出之处,不仅表现在他治水事业中的公而忘私、艰苦奋斗,而且表现在运用诈谋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为夏王朝奠定了基础。他的贪欲和权势欲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是历史发展的杠杆。评价他的历史作用与用今天的伦理观点对其作为进行道德分析乃是并行不悖的两件事。

那么,禹又是怎样一步步地表露他的诈谋并最终夺得了权势的呢?先看《尚书·皋陶谟》中记载的一段禹跟舜、皋陶说的话:

予创若时,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

意谓：当我娶塗山氏女的时候，辛日结婚，只在家里过了辛、壬、癸三天，到甲日就忙着去治水。后来生下了启，启在家里呱呱地啼哭，我都没有功夫去抚育他，我只想着治理水土的大事业。终于辅弼天子设立了五服制度，使管辖区域有了方圆五十里之大，每州设立十二个师，直到四海边缘，都普遍地设立了五长。禹治水的功劳当然不容否定，但他这样自我标榜，并将一切业绩归于自己，就不能认为是完全出于公心的了。禹到处做出一幅积极进取，勤勉辛劳的姿态，实际上是力图扩展自己的影响和势力。舜当时是部落联盟盟主。他与禹之间的关系便应当是十分复杂和微妙的了。在鯀被放逐诛杀之后，禹审时度势，用极大的毅力压抑了自己的不满与怨恨，反而更恭谨地事奉舜，博得了舜的欢心，被任命为司空，担负主持治水的重要任务。这便是《吕氏春秋·行论》中所记载的那段话：

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步不相过，穷气不通，以中帝心。

说禹在舜的左右总是迈着小步行走，甚至连大气都不出，以表示对舜恭敬。尽管禹未必如此奴颜婢膝，但他确实非厚实怯懦之辈，在影响和权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禹便敢于与舜对抗。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曾用离别妻、子，外出治水，“以故能成水土功”的业绩自诩，并以此回绝舜对他漫游淫乐行为的批评。禹既要利用舜的威望以扩展自己的势力，又要排斥异己，削弱舜的势力，从而达到取舜之权位而代之目的。禹的诈谋应是卓有成效的。皋陶是舜的时代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虽然驳难过禹的言论，但终究还是被禹拉拢利用，作为主持刑罚的“士”，他曾“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即命令民众都必须以禹为榜样，假若不按照这命令去做，那么就要用刑罚制裁。在舜的后期，禹的地位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禹在行动中已一步步地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和势力，因而“禹逼舜”的悲剧的发生也就成了社会发展的情理中事。然而，当时传统的民主推举部落首领的势力还是比较强大的。因而禹接替舜的位置至少在表面上还是进行了“禅让”。禹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博得众多部落首领的拥护，终于较顺利地取得了最高统治者地位，被拥戴为“夏后氏”，成为诸夏之族最高的君长，确立了王权。

禹在确立王权的过程中，又继续征伐三苗，他出征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誓师词说：“不是那种无礼小子，谁敢横行称乱，野蛮愚蠢的三苗胆敢化乱，我要代表上天惩罚他们。因此我今天率领你们‘群封诸君’去讨伐三苗！”参加这次战争的有众多氏族部落，声势非常浩大。经过激烈的战斗，“三苗”大败，向南逃往丹水、汉水一带的崇山峻岭中去了。战争中掠夺到很多战俘，他们都成了军事首领的奴隶。这种掠夺战争，进一步加强了禹的地位，并促进了奴隶制度的产生。

为了巩固王权，禹又沿颍水南下，在淮水中游的塗山，大会夏夷诸部众多邦国或部落的首领，这就是“塗山之会”，古史中所载的“禹合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说的就是这件事。此时，原来的众多部落首领，到此时大都转化成了世袭贵族，分别成为各个邦国的君长，他们前来参加大会，对禹朝贡，行臣服的礼节，成为王朝统治下的诸侯。这次大会，乃是夏王朝建立的重要步骤。

按照传统的“禅让”制，禹退位后接替其位置的人也要由部落民主推举而出。然而，社会在向前发展，此时的社会结构已较尧舜时期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于是禅让制也呈现出微妙状态。禹在位之时，选择皋陶为继承人。此举反映了禹的智谋和狡黠。皋陶是偃姓部落首领，早在舜的时期就有很高威望，他曾在舜和许多部落联盟首领面前高谈阔论，阐述选拔人才、治理天下、敬大安民的道理，并且他还是一位治狱讼而著称的人物。禹选择皋陶为其继承人，便能够以此向天下表明自己是重视和真心荐举贤才的。皋陶虽然曾当众诘难过禹，使禹差点下不了台，但后为禹的手段所笼络，曾经“令民皆则禹”，因此，荐举皋陶，实际上是加强了禹自己的权力，扩大了自己的影响。特别应当注意的是，皋陶和禹年龄相仿。据古书记载，皋陶和禹同在舜帝手下任职，从言论和行为看，皋陶甚至是年长于禹。相传禹治水13年，舜荐禹之后过17年去世，所以禹继位时最少也有50多岁，而禹举皋陶之后10年于会稽死去，据说这时禹已经是百岁之龄了。由此看来，禹选定皋陶为继承人时，他和皋陶均已至耄耋之年了。选择一位和自己年龄相仿或稍长的老者为继承人，这正是禹工于心计的表现。因为这样的继承人是不会对禹及其儿子——启构成多大威胁的。

果然，皋陶被荐举之后不久即死去，禹又举荐伯益为继承人。禹死后，益重演禅让的过程，“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覲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为什么人们拥戴启而不信服益呢？汉代大史

学家司马迁解释说：“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这个解释是正确的。所有这些都应当是禹精心安排的结果。禹一方面树立自己和族人的权威，另一方面又通过举荐耄耋之年的皋陶，故意延宕其后继者益开始佐政的时间，造成益“佐禹日浅，天下未洽”的事实。这两个方面的努力即为启的继承权位铺平了道路。所以战国时人便认为“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禅让制度是上古时代权力结构演变的过渡形态。开始的时候，氏族、部落联盟的首领都是民主选举而产生的，他们受到广泛的尊敬、信赖。当时许多重大事情都必须由议事会与民众大会集体讨论决定。后来，各级首领的权力日益增长，他们在递嬗权力的时候不再满足于民主的、集体的决定，而是竭力寻找一种形式既能有民主色彩，又可以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样的形式终于在尧时期被发明出来。那就是“禅让”。在禅让制度下，旧的民主传统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尧舜之际禅让过程中，“四岳”的意见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就是一个明证。然而，部落联盟首领的个人意志毕竟在禅让制度中占了主导地位。如果说尧舜时个人意志在禅让中尚未表现得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到了禹的时期，情况就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禹先荐举皋陶，后举伯益，都是由他自己所决定的，尚未见到史料可以说明这些是由部落联盟其它首领讨论提名的结果。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不断强化，和这种趋势相适应，世袭制的出现具有着必然性质。禅让制就是世袭制的准备阶段，从某种角度上也可以说它是连接原始社会民主制与世袭制的枢纽。

禹运用自己的手腕与权力，为自己的儿子启铺平了一条通向王权的道路。使启能较顺利地接替了禹部落联盟盟主的位置，随即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启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

夏启建立夏王朝的过程，充满着激烈的斗争。因为世袭制的奴隶制国家是一个新生事物，必然遭到传统的旧势力的反对。

东方偃姓部落的伯益首先起来反对夏启。在夏启继位后，他立即撕下了谦让的面纱，率领着强悍的东夷军队，来势汹汹地向启发动进攻。伯益打败了启的军队，并将启俘获，囚禁起来。不久启又逃出，重新组织队伍，向益反攻。经过艰苦的战斗，最后一次交战时，伯益的部下纷纷向启缴械投降，启把伯益抓来杀掉。

反抗的势力不仅来自外部的东夷，也来自夏部落内部。夏族在西方的同姓邦国有扈氏也起兵反对启。有扈氏在今陕西中部、东部一带，是仅次于夏后氏的一个强大的氏族，早在禹的时候，就曾与有扈氏发生过战争。启率领军队亲自讨伐有扈氏，双方大战于甘泽。启在前线发布了誓师词——《甘誓》。他指责有扈氏犯了“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罪行，上则轻蔑“五行”的天道，下则怠慢“三正”的人事。上天因此要灭绝他们的大命，他要奉行上帝的意志去惩罚他们。启命令部下听从指挥，奋勇杀敌，警告不用命的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有扈氏的军事力量相当强大，启开始并没有把有扈氏打败，大约经过1年的较量才征服了有扈氏。《淮南子·齐俗训》说“有扈氏为义而之，知义而不知宜也。”其实，他是死抱住氏族社会的旧“义”，不能跟着时代发展之“宜”前进，自然要遭到失败。

对有扈氏战争的胜利，意味着夏王朝政权的初步稳定和世袭制的初步确立。为了庆贺夏王朝的建立，夏启在钧台大会诸侯，举行宴享，诸侯纷纷前来朝贺。夏王朝的统治得到了诸侯的正式承认。

然而，新与旧的斗争在新事物刚刚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便不会马上消失，旧事物总是不愿一次性地退出历史舞台，而总要经过一番反复。这种斗争，在夏王朝的建立过程中集中表现为王位世袭制与部落禅让制之间的斗争。启传子太康后，太康天天宴饮游乐，不恤民事，引起人民的极大怨愤。东夷有穷民的首领后羿，把太康赶下了台。羿是勇于向自然作斗争的英雄，传说曾在尧时射掉天上十个太阳中的九个而立了功。他做了正式国王后不久，又被他的亲信寒浞杀掉，寒浞取得王位。太康死后，弟中康立，中康子相投靠同姓斟灌氏和斟寻氏，又为寒浞所攻杀，相妻已怀孕，逃奔母家有仍氏，生少康。后来少康又被寒浞攻败，逃奔有虞氏。寒浞因频繁用兵，招致民众反对，内部矛盾增长，夏遗臣靡从有高氏收斟灌氏和斟寻氏余众，攻寒浞；少康也纠合一些亲信氏族，最后，灭掉寒浞，恢复了夏王朝，这就是所谓的“少康中兴”。从此，夏朝奴隶制的政权，才逐渐巩固起来。

夏王朝是从原始公社的军事民主制度中脱胎而出的奴隶主政权，它是历史上的一个新生事物，必然与旧的传统的氏族制度和习惯势力发生矛盾。旧氏族贵族利用传统的“禅让制”，以反对夏王朝的王位世